

本期协办单位:合肥金悦宾馆有限公司

观察

一直希望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之都的上海,其市场化程度却很低。经济结构失衡,缺少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成为上海的尴尬现状。

民营经济不振是上海发展的隐患

罗天昊

《2011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上海市GDP为19195.69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9584.12亿元,国有企业占整个经济比重近50%,而深圳国有企业的比重不足30%。相对深圳的民营经济之盛,上海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有企业的温室。

上海VS深圳: 支柱产业上的差异

对比上海和深圳,两地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很接近。2011年上海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为124.94:7959.69:11111.06;深圳为:0.1:48.9和51.0。但是,在其支柱产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以及文化产业是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而上海的六大重点产业是汽车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石化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等。虽然两地都要建成金融中心,都要以服务为产业重点,但是,在其它核心产业方面,深圳似乎更多偏向高新技术、物流等“轻型产业”,而上海则多为基础性产业。

支柱产业上的差异,使两地经济结构存在巨大的反差。在上海,这些大产业的主体,均为垄断国有企业,而目前上海的一些知名企业,如上汽、宝钢、上广电、上海航空、光明乳业,亦均为国有企业。

相对上海本土企业的暗淡,深圳的民营却非常强劲。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商华为,中国最大的地产商万科,中国电池大王和汽车新贵比亚迪,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腾讯,中国最好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最大手机分销商天音通信,中国最大网络下载服务商迅

雷,中国最大汽车后市场服务商元征科技,中国最大手表供应商飞亚达,中国最大家纺用品供应商富安娜,中国最大特种计算机供应商研祥智能,中国最大ERP软件供应商金蝶,中国最大女鞋品牌百丽——众多知名品牌,都崛起于深圳。

如果说深圳的民营企业是“饿大的”,上海的国有企业更像是“喂大的”。

在众多的产业领域,深圳都诞生了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而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并非靠国家政策倾斜或者垄断地位起家,而是在残酷的竞争中百炼成钢。它们具有强大的自我造血功能。

为什么如晨星的最具竞争力企业都诞生在深圳?

相对上海,深圳的企业更多是从草根阶层发展而来。而事实证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往往产生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如家电行业出现了美的、格力、格兰仕、TCL等巨头。城市同样如此。深圳是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城市,同时,深圳也是经济最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和闯荡精神的城市,这种优势,是国内其它城市都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深圳成为产生具有竞争力企业最多的城市的根源。

深圳企业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那些优秀的知名大企业,更在于无数有竞争力的小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集大成者,深圳是“山寨机”的发源地,而事实上,在很多行业,山寨企业而非“庙堂企业”才更富有活力。

相对之下,上海的政策似乎更倾向于扶持大企业,只要顶层,不要地基,要想建造万丈高楼,岂非荒谬?深圳开放的竞争环境,使本土企业自由成长,深圳自主品牌达到5万多个,成为中国的品牌之都。以一隅之地,竟占中国世界名牌数量的1/10,远远超越国内其它城市,更非上海可比。

在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程度的“软

产业”领域,如文化创意领域,上海在硬件远超前深圳的情况下,却仍然落后,其产业占比,无法达到深圳7%的标准。创意产业一度被视为上海扶持第三产业的要点。但是,上海热衷于大搞创意园区,然后就发展成地产项目,不仅抬高了租金,也没有形成创意产业的系统服务优势,对于还在起步之初的创意企业来说,难以承受的高成本将导致园区空巢化。

上海VS全国: 需重新注入活力

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成为上海国有企业的致命伤。其成长少靠市场竞争自我成长,多依赖于国家倾斜性的支持,或行政力量垄断经营。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过多,不仅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更造成了整个经济体系效益低下。

由于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很多民营企业开始逃离上海。有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前后,有7000余家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而把总部或重要部门迁往杭州、宁波、香港。而今日的电子商务大王马云曾经希望在上海创业,结果因为无法生存,最后移师杭州。

在发展民营企业方面,上海不仅与其希望的“经济之都”严重不相称,甚至还落后于内地众多城市。最后的结局是,国有企业大而不强,民营企业少而脆弱,造成整个经济的效率低下。而这一切,都在于上海“重国企轻民企”的政策所致。

在上海注册一个企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上海强势政府的过于细致的监管风格对中小企业发展活动的影响较大。而一些新的国企成立,则往往是特事特办,在审批上一路绿灯。

据报道,上海一些职能部门“明哲保身”的想法很明显,企业在审批环节受阻。一些权力下放到各区县的“中低端干部”手上,他们直接与企业打交道,利用职权的小腐败风气开始显

现。在“楼脆脆”事件中,很多股东就是梅龙镇一些级别并不高的官员。

而上海过高的房价,直接推高了商务成本。目前在世界20个大城市中,上海的商务成本排名在全球前20位之内,在国内仅次于北京。过高的商务成本产生了“挤出”效应,不少民营企业开始选择到低成本的上海周边城市投资。

目前,同在长三角,常州非公经济所占比重达59%,无锡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60.8%,杭州非公经济所占比重已达68.6%,而宁波非公经济创造的GDP接近全市经济总量的80%。在北方内陆区域,河北的非公经济比重达52.9%,而在传统的重工业地区东北,哈尔滨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50.6%,在中部,河南、湖南的非公经济比重分别达到59%和54.5%;在西部,四川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52.1%。众多的内陆省份和地区,民营经济均已经成为主体,所占比重都超过了50%。

如此而言,上海的民营经济,不仅落后于沿海先进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来看,都属落后之列。连曾经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甚至西部的部分地区,民营经济都要比上海活跃。

就全国棋局而言,根据全国工商联的预测,未来三年内,民营经济比重将达到70%左右,如果按照这种标准,上海更需快马加鞭。

最近,由上海市委市政府牵头召开了非公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座谈会,未来,上海将在财政扶持、产业发展等政策上,从对单个企业“发点球”式的扶持转向面向整个行业的“普惠”式支持,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在行业准入、扶持政策等方面,想方设法破除政策壁垒,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

在未来,致力于市场化,调整上海的经济结构,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生存空间,方能使上海重新获得活力。

北京科技企业欲长三角“安营扎寨”

运营成本低、市场空间大是吸引科技企业南下的重要砝码

本报记者 江丞华

一线城市,不再是吸引科技产业“安营扎寨”的首选之地,相反,日益增加的运营成本已成为高技术企业逃离的最直接原因之一。

而今,这一幕在北京高技术产业领域上演。

北京科技产业外移加剧

日前,北京的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锋教育网、清华阳光能源开发等一行十余个科技企业去了无锡、嘉兴两地,考察了北科建无锡中关村软件园太湖分园和北科建嘉兴长三角创新园,据了解,此行主要为企业下一步发展选址。

考察期间,有企业明确表示,如果条件适合,可以考虑将企业迁移过来永久发展。

事实上,在此之前,纽曼、千橡等科技企业已率先走出北京。

很久以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都是各大公司在选址时优先考虑的地方。但是,曾经让众多科技企业十分向往的北京,现在却成了很多企业急于逃离的地方。科技企业为什么要逃离呢?

“之所以考虑新的发展地,除了企业发展战略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成本因素,北京的运营成本太高了,土地、租金、薪资、水电费逐年上涨,企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企业成长受到制约。”谈及此次南下的原因,先锋教育网总经理陈雪峰无奈地表示。

北京大学教授刘澄表示,“北漂一族”有一种趋势叫“逃离北上广”。现在不仅是北漂们,一些企业也开始“逃离北上广”了。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逃离的原因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成本太高。

数据显示,仅2012年上半年,北京优质写字楼租金同比增长46.8%,增幅居全球首位。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资源紧张,直接带来土地、劳动力、水、电等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剧增的办公成本成为很多科技企业所不能承受之重。

长三角或现“新中关村”

身在北京这一人才技术高地的科技企业,缘何将选址目光投向了千里之外的长三角?

有上述北京科技企业表示,科技企业要求租金相对较低,又希望有好的办公环境,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此外,和银行、咨询等行业不同,科技行业所面对的市场是以技术为基础的需求,对于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其市场日趋饱和,相比之下,长三角地区的二三线城市却极度饥渴,市场空间极大,这正是企业选择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原因之一。

以北科建嘉兴长三角创新园为例,与北京等一线城市相比,其落户、运营成本仅为其1/3甚至更少,但其在环境、技术需求和成果转换上却更具优势。

业内人士表示,根据经验,只有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会对自主技术有需求,才希望通过技术提升产业结构,才能把技术和产业结合起来,而长三角城市作为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早已具备这一基础,这对于科技企业成果转换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长三角区域作为全国人口涌人的集中地,人才聚集度仅次于北京等一线城市,足以满足科技企业的人才需求,同时还能占据人力成本较为合理的优势,多重优势聚合,构成了长三角城市吸引北京科技企业南下的重要砝码。

“从目前区域产业园区发展现状来看,急需一个类似于中关村这样的强势品牌园区出现,来引领园区建设水平的提升,并对区域政府政策服务进一步优化产生影响。”业内人士认为。

从日前这批南下考察的企业反馈来看,无锡中关村软件园太湖分园和嘉兴长三角创新园有望胜任这一重任。

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有中关村西区、中关村软件园、生命科学园等国际化专业科技园区开发的成功经验在前,他们对北科建集团打造“长三角地区的‘中关村’”的能力不容置疑。

长三角科技园区面临新考验

面对可能出现的科技产业转移大潮,身为首选接纳地的长三角科技园区也将面临着新的考验。

这一考验来自于企业需求,在考察之前,对于选址,有企业也有自己的疑虑:在离开原有的环境后,企业能否适应新的土壤?是否有足够支撑企业发展的各类人才?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企业移师后水土不服的先例不胜枚举,其中不乏高技术企业,而其遇挫的最大原因,则源于人才供应不足、园区平台支持服务弱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动。

从平台支持与人才供应来看,作为长期盘踞在北京中关村的企业,早已习惯了北京全国一流水平的服务平台与高校、人才密集的优势,在这里,无论是孵化服务、人才支持、信息咨询,还是企业融资、中介服务等方面拥有足以满足企业发展所需的全方位的硬、软件环境,和这一水准相比,当地园区显然尚有不小差距,而这种差距极有可能造成南下企业水土不服。

数据表明,受益于国家级孵化器,中关村科技型中小企业存活率达到80%,位于中关村西区的创新工场存活率甚至达到90%,高于孵化器之外10倍之多。

不过,当地政府已充分意识到这些短板,并有意识加以弥补。尽管如此,新的考验还不止于此,中关村科技园区最吸引企业的在于其强大的优惠政策,而长三角城市对科技企业的政策支持固然强大,但与中关村园区相比,在政策细化和落地方面仍有不小的差距,这对于有意进驻的企业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点。

尽管如此,新的考验还不止于此,中关村科技园区最吸引企业的在于其强大的优惠政策,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窗口科技园区,仅从2009年至今,国家和北京市政府针对园区产业出台的扶持政策就多达数十个文件,已形成全面、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

此外,园区还自主加以强化,以至其政策支持力度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而长三角城市对科技企业的政策支持固然强大,但与其相比,在政策细化和落地方面仍有不小的差距,这对于有意进驻的企业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点。

紧跟世界步伐 铸造一流建筑

——访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文开良

梁长年 李清道

中建三局是在世界建筑史上年轻而又名不虚传中国建筑业的领跑者,秉承“敢为天下先,永无止境”的开创精神,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文开良,中建三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国家一级建造师,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鲁班奖获得者,被这些美丽光环笼罩的他却是一个平易近人,善良大度,和蔼可亲,永攀建筑高峰的人。采访中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是从农村走出来农民的儿子,我很感恩我们的祖国和社会,没有强大的祖国也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能为祖国的建筑事业做点事,也是我的荣幸。”

“重要的是 怀抱理想且不放弃”

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从上到下,从领导到员工再到基层的各个岗位,都有一种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精神,为建筑业发展精益求精。文开良常对身边的员工说:“求知若渴,虚心若愚”,保持求知状态,只有这样你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才能



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文开良(中)在工地检查

不断地创新和前进。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很多机遇,但机遇是有代价的,有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往往成为人生的分水岭。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除勤奋外,就是要积极进取和创新。虽然,每个人的天赋有差别,但作为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的每个员工要有理想,创新和目标。无论工作怎么变动,重要的是怀抱理想、信念、开创而且决不放弃努力,有信心不一定会成功,但没有信心

一定不会成功。

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在文开良以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新思想的带领下,“披荆斩棘”为天津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天津滨海新区高速建设成中国第二个浦东新区添砖加瓦,贡献“光”和“热”,他们背后一枚枚奖牌和一幢幢高楼,铭刻着作为领导者的他创业艰辛和人生之旅的成功和辉煌。

人生路上每个人都有成功和失



中建三局天津分公司职工合影